

边疆治理现代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构逻辑研究

唐甜甜*

重庆理工大学, 重庆 400054

DOI:10.61369/SE.2025100032

摘 要 : 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系统考察边疆治理现代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双向互构机制,从历史、理论与现实三重维度解析其互构逻辑。历史逻辑呈现二者从“边疆管控”到“共同体建设”的嬗变,历经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权巩固与共同体意识萌发、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发展与意识塑形、新时代治理现代化与意识统合三阶段;理论逻辑体现为物质生产“基础性互构”、制度建构“规范性互构”、文化认同“整合性互构”,契合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统一原理;现实逻辑揭示当前边疆治理面临公共服务分化、文化认同障碍、治理机制矛盾等结构性张力。研究为二者良性互构及新时代边疆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关 键 词 : 边疆治理; 现代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双向互构

Research on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Logic between the Modernization of Border Governance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ommunity

Tang Tiantian*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ongqing 400054

Abstract : Based on the Marxist theory of state governanc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two-way mutual construc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modernization of border governance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ommunity, and analyzes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logic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history, theory and reality. The historical logic presen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wo from "border control" to "community building", going through three stages: the consolid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emergence of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haping of consciousness during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new era. The theoretical logic is reflected in the "fundamental mutual construction" of material production, the "normative mutual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the "integrated mutual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which conforms to the dialectical unity principle of social existence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realistic logic reveals that the current border governance is confronted with structural tensions such a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obstacles to cultural identity, and contradictions in governance mechanisms. The research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benign mutual construction of the two and the practice of border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 border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ommunity; bidirectional interconstruction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的主线”。^[1]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出系列战略规划与政策举措,聚焦加速边疆发展、提升边区治理效能、完善边境基础设施,推动边疆繁荣与边境稳定,这些举措将边境治理提升至国家发展议程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加强边疆地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

边”。培育中华民族共同意识，推动了边疆民族地区公共秩序的现代化进程，为地方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与政策工具，而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实践，也为持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意识构建了支撑机制。

一、历史逻辑：从“边疆管控”到“共同体建构”

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边疆治理领域的创造性运用，我国边疆治理经历了从传统管控模式向现代治理体系的范式转换。这一转换既呼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又将培育强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核心线索贯穿始终。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权巩固与共同体意识的萌发期

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新生政权面临边疆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民族分类运动构建了56个法律地位平等的民族单元，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农奴制、将生产资料分配给边疆农牧民，推动经济公有制逐步确立。这一阶段形成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原则，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情感基底。1950年代开展的“直接过渡”政策在云南等边疆地区的成功实践，创造性地实现了传统社会形态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跨越式发展，为共同体意识的萌发提供了早期制度载体。

（二）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发展与共同体意识的塑时期

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转移，国家通过“对口支援”“定点帮扶”等机制重构边疆发展格局。数据显示，1999–2012年间仅中央财政对西藏的转移支付就达2600亿元，相当于该地区同期GDP总量的4.3倍。这种大规模的资源倾斜不仅缩小了边疆与内地的经济差距，更重要的是通过产业协作建立起跨区域的利益联结机制。例如，“西电东送”工程带动云南、四川等水电资源富集区年均经济增长超10%，使当地群众切身感受到国家发展战略带来的实惠。在此期间形成的“三个离不开”思想，标志着共同体意识从政治认同向经济认同的拓展。

（三）新时代：边疆治理现代化与共同体意识的统合期

“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是关系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的大事，是关系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大事”。^[2]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工作政策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主线。2021年制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十四五”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规划》等里程碑式文件，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模式上升为制度规范。同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通过的“十二个必须”，首次将“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纳入治理框架，标志着治理实践与认同构建从“临时协同”转向“规则共生”。新疆“文化润疆”工程框架下打造的“中华文化主题公园”、西藏打造的“红色旅游路线”等示范性创新实践，正将这一融合逻辑具象化呈现，行政效能提升与认同凝聚已形成同步推进的设计安排。

二、理论逻辑：双向互构的内在机制

边疆治理现代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形成协同互动，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在边疆治理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一过程并非线性的单向因果链，而是贯穿

物质生产、制度建构与文化认同三重维度的双向反馈机制，生动诠释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辩证统一逻辑。

（一）边疆治理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建构

边疆治理现代化是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基础性环节。通过重构生产体制与利益分配机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提供物质经验支撑。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地主制、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民族分类制度推动边疆“边缘主体”转变为国家治理的平等参与性力量。1978年改革开放后，“结对帮扶”“边疆振兴”等政策加速区域经济增长，占全国比重持续攀升，同步带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这种依托区域产业链协同、劳动力流动与资源整合的增长模式，构建了共享利益的跨民族共同体。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由此形成的日益紧密的利益网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物质性根基。

（二）边疆治理现代化重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边疆治理现代化通过重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机制，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纳入国家现代化整体议程。广西构建“自治区条例+单行条例+变通规定”三级立法体系，西藏打造“人大代表联络站+政协委员工作室+基层立法联系点”参与式治理网络，二者共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具体治理运行程序。通过这些创新既保障了少数民族自治权，又将“五个认同”内化为常态化、规范化的实践成果，搭建起制度化实践平台，推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同实现反复实践与持续强化。“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非单向度的价值灌输，而是通过主体能动性的激发形成治理效能的倍增效应。当边疆各族群众在治理实践中切身感受到“休戚与共”的利益联结时，就会产生维护共同体存续的价值自觉。

（三）边疆治理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度动态互构

边疆治理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互构呈现出螺旋上升的发展态势。二者的互构机制既包含物质生产的“基础性互构”，也包含制度建构的“规范性互构”，更包含文化认同的“价值性互构”。这种多维度的互构关系不是静态的平衡状态，而是在应对跨境文化渗透、发展不平衡等现实挑战中不断调适的动态平衡。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5]在新时代的边疆治理实践中，这种自觉性正通过双向互构转化为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强大精神力量。

三、现实逻辑：新时代边疆治理的多重张力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边疆治理现代化

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双重使命，正面临多重压力的现实考验。全球化对边疆地区施加的结构性制约、国家治理体系改革引发的内生性治理波动，以及全球政治格局深度调整带来的外部冲击。这些压力的复合作用，将传统边疆困境与新兴治理难题交织叠加，构成了复杂的挑战矩阵。

（一）边疆地区的治理效能受制于深层次结构性短板

地理区位偏远性与历史投资欠账叠加，导致公共服务供给存在显著区域分化，西藏阿里地区医院床位密度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新疆喀什地区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严重不足。与此同时，数字鸿沟问题亦呈加剧态势，云南怒江大峡谷部分村落仍未实现5G信号覆盖，内蒙古呼伦贝尔牧区光纤网络普及率不足50%。此类技术盲区导致少数民族群众难以便捷获取电子政务、智能法院等新型“移动化”治理服务，破解空间隔离问题已成为当前政策实践的紧迫任务。

（二）边疆地区的共同体意识培育面临双重障碍

边疆地区的共同体意识培育面临双重障碍，即文化适应困境与价值共识疏离。跨境流动催生的“文化折扣”效应正呈现代际扩大趋势，新疆南部维吾尔族青少年普通话达标率仍未达到政策预期，康巴地区藏族学生的中文经典阅读量仅为内陆同龄群体的三分之一。语言与文化鸿沟的背后，更深层的价值裂痕正悄然扩散，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张力引发少数民族社群内部价值体系的分化，威胁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历史脉络中的延续性建构。

（三）治理机制层面的结构性矛盾加剧互构困境

政策执行偏差问题在省际交界地带尤为突出，暴露出多部门协同机制的缺失。基层治理网络的渗透力不足同样值得警惕，基层协商议事会中少数民族代表比例低于法定标准15%的案例仍然存在，民族聚居社区甚至出现“形式参与”现象。更具警示意义的是治理效能评估体系的滞后性，现行考核指标体系中“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类指标权重太小，且缺乏对“文化认同度”“治理参与率”等核心指标的量化监测，导致政策实施效果难以精准评估。这种评估体系的失灵，使得“重管理轻治理”“重形式轻实效”的治理偏差难以及时纠偏。

（四）新时代边疆治理正处于双重需求升级的紧迫节点

边疆居民诉求呈现快速多元化态势。林芝巴色乡藏族村民对乡村旅游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新疆伊犁州扎木什牧民对智能牧场技术的期待已远超既有供给能力。此类需求的结构性跃迁，推动治理体系从“基本保障型”向“品质提升型”范式转型。与此同时，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亟需构建更系统、更具制度效能

的载体，推动情感归属向日常实践转化。只有构建“治理效能提升”与“认同建构深化”的共振机制，才能实现边疆治理体系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良性互构。

（五）新时代边疆治理张力的破解与双向互构治理框架构建

新时代边疆治理的挑战本质上是传统治理范式与现代性要求之间的张力表征。边疆地区因地理区位的特殊性、民族构成的多元性及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面临更为显著的发展阵痛与持续的适应性调整。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6] 破解当前困境的关键，在于构建起“国家在场”与“文化在场”的双重治理框架，既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筑牢治理现代化的制度根基；又要创新中华文化认同的实践载体，激活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内生动力。这种双向互构的治理智慧，正在新时代边疆治理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四、结语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为指引，系统探究边疆治理现代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双向互构关系，从历史、理论与现实三重维度展开深入分析。历史维度上，二者关系历经三个阶段嬗变：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民族平等原则、土地改革及“直接过渡”政策，实现政权巩固与共同体意识萌发；改革开放时期依托“对口支援”“西电东送”等机制构建跨区域利益联结，推动共同体意识从政治认同向经济认同拓展并形成“三个离不开”思想；新时代以政策文件为支撑，将治理模式制度化，完成从“临时协同”到“规则共生”的范式转换。理论维度上，其内在机理体现为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三重双向互构：物质生产“基础性互构”为共同体意识提供物质根基，制度建构“规范性互构”将“五个认同”转化为常态化实践，文化认同“整合性互构”升华“四个与共”理念，且共同体意识反作用于治理形成“价值认同—主体参与—治理优化”正向循环。现实维度上，当前边疆治理面临公共服务分化、数字鸿沟、文化认同障碍、治理机制矛盾及居民需求升级等结构性张力，研究提出需构建“国家在场”与“文化在场”的双重治理框架，为二者良性互构及新时代边疆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与路径参考。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入做好边疆治理各项工作 推动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12月11日，第1版。
[2]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9月30日，第1版。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4] 习近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8月29日，第1版。
[5]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1。
[6]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19-09-28(2).